

朱绍文^①

地点：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

时间：1994年11月18日

至1995年2月24日



朱绍文

钟：朱老，今天很高兴能得到您的直接支持，在我近日找的老留日学生里，您去的时间比较长，想请您讲讲当年的情况。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您在当年为什么要去日本？您怎么去的？

朱：你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，特别是30年代中国青年为什么去日本？这从中国近代史来说，对中国现代化来说，是有很深的很重要的意义的。

我是1934年7月在上海高中毕业的。当时我们学校中一部分人想就

①朱绍文，1915年生，江苏人，1934年9月赴日留学，1935年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，1939年考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。1945年春回国，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。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专门委员，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日本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，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，东京大学客座教授。

业，一部分人想升大学。我们在中学已经学习两门外语，一门英语，一门日语。我们正始中学里，教师有外国人。日文有两个老师，一个中国人讲文法，一个日本老师讲口语，教小说。英语是从小学就开始，更不用说了。

当时的浪潮是怎样抗日，这也是当时内心深处的时代课题。我们看到日本人在上海打仗，老师说：“你们才十几岁，应该准备好为国家图强，为国争光，民族解放。”当时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前夜，国耻和清朝近百年的耻辱、济南惨案、五卅惨案，这些在我们做小学生时就有很深的印象和烙印，知道在人生中要奋斗。

我们学日语，文法是日本出版的书，日本老师教的日本小



在日本留学时朱绍文（前左2）与同学合影

说是菊池宽^①写的，和同文书院无关，是老师自己选择的。我们就有这样的基础。我当时不想在国内念大学了，日本回来的老师对我们说：“中日问题，早晚要爆发，你们要长久打算，百年大计。你们要卧薪尝胆，到日本去。”另一个原因是便宜，在国内上大学，一个月起码40元；到日本相同生活，36元就够了。所以我们一划算就准备去了，那时还以为学制相同，中国高中毕业到日本就可以上大学，不了解日本学制。我在中学学得很好，每次考试都得第一，老师特别寄以希望，要我把学问学回来。

那时我父亲是中产阶级，不依靠我生活，就是岁数大了，希望我能回去接班，希望我念两年就回去。他给了我几百块大洋，我就上船了。

我是7月高中毕业，9月14日从上海乘船去长崎，什么手续也不要，就带着高中毕业证书上船，也不用签证和护照，仅在上海领事馆登记了一下。

我买的统舱票，船名长崎丸，我坐了三天三夜，睡地板，喝酱油。上海当时是殖民地，我们中学在租界里，洋楼电车司空见惯了，到长崎一看，两层小木头房子，日本人穿的和服也差，木屐的声音响成一片，没有感到有什么了不起的现代化。上岸到饭店吃饭，第一个受不了的，是下女跪在旁边，给你盛饭。我们做学生自己惯了，也不好说，这个印象很深。我觉得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街也破旧。但长崎是个海港，看岸边的仓库很整齐，印象很深。贸易国家的仓库很重要。

^① 菊池宽（1888—1948），日本作家。1923年创办《文艺春秋》杂志。其主要作品有：《无名作家的日记》（1918年）、《恩仇之外》（1919年）、《藤十郎之恋》（1919年）、《珍珠夫人》（1920年）等。

我是来求学的，当晚乘火车去东京。在车上有警察来盘问，他跟着我们。所以我的第二印象是：日本是一个警察国家。我们当时是小孩子，警察也来盘问。警察也知道没什么，但还是问来问去。他是一直追踪我们的。

钟：您第一次接触到日本的人际关系，就是警察。

朱：是呀。感觉日本警察怎么追踪这么厉害，在人家睡觉时，他来盘问你，心里非常不痛快。一考虑，哦，日本这个军国主义这么厉害，留学生也盘问跟踪这么紧。从这件事到我被从监狱中放出来的10年间，印象很深。相当厉害，那个警察穿着警察服装，公开身份。

到了东京，我们住在一间临时屋子里，学生自己做饭。我是9月19日到东京，而日本学制是9月开学3月毕业，4月开学9月毕业。所以我当时没有什么学校可报考，就先补习日语吧。我就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，在神保町。松本龟次郎先生是校中的教员，教日本文法，写有一本书。人胖胖的、高高的。

他那时还不显老。我听他的课。我听课没有困难，全都懂，写还不成。在日本学习是好。我就搬到学校附近去住，在神保町街上，我去租一间小商店的二楼，一个月8块钱，一个人住，约有6—8席大小。

钟：您记得老师上课的情形吗？

朱：上课分几个班：高级、中级、初级。松本老师教的班不固定。学生较多，起码30人一班。当时有位椎木老师，他教口语，有一本蓝皮的教材，教得很认真。中国学生学习有一半认真，一半不认真，不认真是去玩的多。上完课，11点半，各奔东西，去旁边小饭馆吃饭。

还有位鱼返老师，我也听过课。我学口语时间不长。我知道如果想考东京大学，需要高等学校替你报名。当时其他大学

很多，明治大学、中央大学等，我都不想上，就想上东京大学。当年早稻田大学的文学不错，庆应大学的经济学、医学也不错，但我都不想去。

想上东京大学，就要考第一高等学校，就要考汉文。考汉文对中国人非常难，是按日语的念法来写来考，非常难。例如：“子曰学而时习之”。他要你写日文，主语、宾语用日文标出来，中国人不知道用日文怎样解释，非常难。所以我又专门请一个汉语老师教课，学汉语的日本念法，这样才可以入门。

钟：现在搞历史、搞日本古语的人，才学这种知识吧？您作为要上一高的学生就开始学了。

朱：准备考试呀。当时很伤脑筋，因为很难学，是日本念法古汉语，比中国的要严格，是日本文法自己传统的，真是煞费苦心的。

我还要准备考数学，我在中学只学到平面几何，所以我又到水道桥的研数学馆学习数学。在水道桥，现在房子还在。一些没考上大学、高中的人，基本在那儿补习各科。我是补数学，要收费的，不贵。我在考前集中学这两门，同时也就学了日文，对于我掌握日文语法很有帮助。

钟：插一句话，您从上海这种文化圈中去的，学这样困难的知识，您在当时同学间，自己感觉文化上的适应是否容易？

朱：可以补充一句，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，不知道是否有人像我这样做的，因为他们各有想法。学习太紧张。

我住在神保町这一段时间的生活，很有意思，因为门口就是旧书店，吃完晚饭走5分钟，就逛旧书店了。那时，神保町的旧书店全是二层楼的木头房子，古色古香，进去随便看，主人还介绍你要看什么，好像不是做买卖的，很亲切，非常舒服地随便看书。另外，书店还有夜市，每天晚上在地上铺上书刊，

点个小煤油灯，什么样的书都有。在三省堂门前马路上，再旁边进去小胡同里，每天晚上摆上书摊，一个人摆几十本，点个灯。我就在这儿学到不少日本文化，也不需要买，站在那儿看就行了。

我当时的目标是学习经济学，在进东大以前，要同别的学生一样学习、准备。但我去日本就准备进东大经济学部。

钟：您为什么决定学习经济学？

朱：我在国内就喜欢学商科，高中时的商科，我已经学习许多经济知识，自己兴趣所在，所以目标明确。

在神保町生活这一段十分好，用钱也很少，我也没有穿和服和木屐，很快就适应生活。后来进一高才穿木屐、穿草鞋。我单独搬出来后，第一天晚上睡觉十分害怕。因为在中国人中间没有问题，还没有离开中国的感觉，心里放心。自己找了房子，搬到日本人家中，第一个晚上就想：哎哟，不要有日本人来杀我。日本房间之间隔的是纸门，所以第一晚心里七上八下，不知道太平不太平。对日本还是有恐惧心理，环境安静是以后才知道的，以后才习惯。当时想家是没有用的，去日本是干什么去的！只有想往前奔，不要给国家丢脸，达到自己学习的目的。

所以，接受了日本生活方式，也接受了日本文化，神田书店就完全等于我的书房。近来我去东京，又去看那里一个书店，觉得没有以前那样有意思了。以前书店里有各种各样的书，现在专门化了，一个书店卖东亚的书，一个书店卖现代的专门的，没有以前的味道；当时的老板还能同你聊天，现在没有一个是了。我那次去的，是过去很熟的一家书店，现在很高很大，全卖外国书。店主的祖父我很熟。他的父亲龙太郎也是一高生，也是东大的同学，很熟。现在第三代了，他也有40多岁了，经营也很好，我跟他聊了一会儿，他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手中正忙些事。”



东京神保町古书街

我就说不打搅了。他们祖孙三代，现在完全欧化了。

我在日本就这样开始，一是采用同日本人完全一样的学习方法，中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很少；第二点就是我利用神保町这个天然大书库来学习。

当时在神保町，还有两个同中国留学生关系很深的机构：一个是青年会，木头大房子，有一些活动在那儿举行，可以去玩玩；另一个是日华学会，就在青年会对面，一条街上，从我住地走两分钟就到了。在里面没有茶喝，就是打打乒乓球、台球。旁边有一家叫扬子江的小饭馆，我们在那里吃猪蹄子，很便宜，顶多一毛五分一个。我记得，那时溥杰^①也在那儿吃过。我那

^① 溥杰，1907年生，满族人。清朝皇帝溥仪之弟。1929年赴日本学习，1935年回东北。

时看他穿军装，士官学校的，还有跟随他的人，瘦瘦的，我同他不熟。吃饭的多是中国去的公子哥儿，大部分学生中成大才的不多。吃中国饭，说中国话，在一块儿玩打麻将，顶多逛逛神保町。呆了五六年的，回来也不会说日本话，这样的留学生也有。这都是有钱的，连金都不一定要镀，连文凭都不用买。

第二年，1935年春天考试，我就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，在本乡的一高，老的一高。我成了本乡一高的最后一班学生。一年以后，本乡的房子让给了东京大学农学部，农学部的房子交换给一高。当时一高学生们穿着制服，扛着枪，打着绑腿，像相片上那样，一直走，走到驹场。

我感受最深的是，日本学生一考上一高，那就是天下的秀才了，在日本最高级的秀才了，一个个很高兴，所以在一高三年间，喝酒啦、玩啦、看书啦，自由地发展个性。

钟：考试时中日学生录取标准一样吗？

朱：可能不一样。就没有考我汉语，说：“你是中国人，还考什么汉语。”这对我是件大好事，真要考汉语可就麻烦了。考取后第一关就过了。

我考上了一高，可我还不知道一高多么有历史传统，反正要考嘛，就考中了。学校在本乡，我在4月里的一天进学校，那一天，受到很大的冲击。我在上海上学很特殊，生活都有茶房管的，铺盖卷到门口，茶房就会拿到屋子里。我就总有这个印象，以为到门口，就有服务员来拿行李。我在住地将行李箱子装好了，到门口叫了一辆“尼几卡”（小三轮车），像是没有蓬子的三轮车，后面多一个放东西的位置，连我就全运到学校门口，谁也不管了。门房问明我是新生，他不准三轮进校门。校门全是石子路，就我站在那里。我想，总应该有人来接我，分配我住在哪儿。我只知道在朵寮三番。可是什么人也不来，有

行李又有箱子，举目无亲。我无奈，也只好扛起行李往里走，忽然看见大门里正面一棵大橄榄树，树很大，树下有个墓碑，碑上写着：

“朱舜水^①先生之墓”

哎哟，我一看见这块碑字，十分震动。我本来感到很寂寞，孤苦伶仃似的，一看见这个碑，橄榄树下中国人的祖先，也姓朱，我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并不见外，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。这个印象一辈子都很强烈，有一种崇敬的东方人的精神的感觉。当时在上海读书学习，眼睛全盯着西方，崇洋媚外。毕业就只想进银行、海关、邮局这三个地方。现在我到了日本念书，金饭碗置之度外，只有追求真理。我从门口，扛着行李箱子，走到200多米以外的宿舍，满身大汗。路也是曲曲弯弯的，房子全是二层木头的，破庙似的，比古色古香的还破烂。这是东方儒家的生活味道，我想到是颜回居陋巷的感觉。外面是马路，现代化的；旁边是东京大学，西洋化的；只有我们里面是日本式的。

一高是中学毕业才进去的，有人说是预科，但它是独立的。三年，学习准备进大学的基本功。外语是学扎实了，哲学也搞清楚啦。文理科两个系统，有英文为主，有德文为主，所以分甲、乙班。我是以英文为主，但也得会两门外文，德文也得会。在学校读书很自由，随便你看书，郁达夫变成搞文艺的，就这样来的。学生就是在校内学，念哲学、念文学的，特别风行。学校是人生的开始，塑造自己的个性，自己人生的摇篮。宿舍房

^① 朱舜水（1600—1682），中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。原名朱之瑜，号舜水。清兵入关，他流亡于日本等地，参加抗清复明活动。后定居日本，讲学23年之久，提倡“实理实学”，强调“学问之道，贵在实行”。他在日本广泛介绍中国文化及多种技艺，培养许多学生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。1715年，《舜水先生文集》在日本出版。1913年，《舜水遗书》在中国出版。

子并不好，教室还算好，是一个二层楼。我们在生活上是穿破草鞋，光脚丫，破衣破帽，反而吃香。

我是少爷出身，背着铺盖走进校门，满头大汗，真是等于劳动改造一样。我好不容易走到宿舍，到自己睡觉的地方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连床都没有，就是两排长长的塌塌米，跟筒子楼一样，上面钉了几块板子，放箱子用。塌塌米上睡几个人也不一定。我进去时，已经有四五个人睡在里面。在城市住惯的人，一下子到这像古庙的地方来生活，对我来说，当时还不感到有什么，现在回想，一辈子受益无穷。东方人的艰苦奋斗，志士仁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，给我印象很深，对我个性形成非常有益。

对日本人来说，这是武士道精神，讲究质朴刚健，生活极



东京一高纪念祭（1934年）

为朴素。日本东京大学学生是以天下秀才自居，是国家的栋梁，事实也是如此，是第一流的。在日本概念中，提到是东大毕业生，不算稀奇；提到是一高东大毕业生，就是日本精华了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了。我进去就没有日本人那种骄傲感觉，我只是想到要把日本的本领学到手，把日本的情况了解透彻。因为我在去日本之前，当时别的同学去欧美，我在日记上就写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

钟：那么您怎么样提高自己的本领？

朱：进学校就上课啦。同中国不同，一高的视野是全世界的，哲学必然是黑格尔^①、康德，普遍从此开始；搞文学是歌德^②、席勒、莎士比亚啦，特别是德国的受欢迎。

日本学生生活就很轻松，闹啦喝酒啦。我到校第一天晚上睡觉，到夜里一点来钟，突然间，上届学生敲着木棍，唱着就进房间来了，到新生屋子里，乒乒乓乓。他们一个个已经喝醉酒，一个个对我们训话，上届学生对下一届新生的训话。训话的内容就是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进一高吗？你知道一高的精神是什么？这方式是一代代传下去的，用的话极为粗野。我这是第一次直接进入日本社会，当时房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，印象是他们日本人的传统教育，以学校为训练国家栋梁场所。同时我睡得糊里糊涂，也有点反感，觉得这样做多么没有礼貌啊。这样的办法，可能西方也有，中国传统没有这个，这是尚武精神。

① 黑格尔(G·W·F, 1770—1831),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, 辩证法大师。他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, 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, 形成哲学体系, 对人类思想进步影响极大。主要著作有:《精神现象学》、《逻辑学》、《哲学全书》、《法哲学原理》、《哲学史讲演录》、《历史哲学讲演录》等。

② 歌德(J·W·von Goethe, 1749—1832), 德国诗人。其代表作有:《浮士德》、《赫尔曼与窦绿台》、《爱欲三部曲》、《威廉·迈斯特》、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等。有《歌德全集》143册。他的诗歌对德国及世界都有重大影响。

所以在一高3年之中，同日本学生关系也好，很多同学都有回忆。我就是觉得很辛苦、很拼命，3年间拼命学习读书。我从中国来的，日文怎么样也赶不上日本人，而且老师是按照一高标准要求，所以日文要拼命学。明天要学习日本古文了，你就得查字典。《源氏物语》、《万叶集》、《竹取物语》等等，这许多日本古典文学，用语和现在不同，又没有参考书。日语在一高自然不算外语，你要了解日本社会，了解日本人感情，你不念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的，就不可能了解。日本古典文学的许许多多，同中国古典文学有相承之处，但更鲜明、更突出、更精练。就像《红楼梦》很好，但《源氏物语》更符合日本岛国社会情趣，符合日本人感情。想了解日本，你不花工夫，不可能学好，如不念几本日本古典文学，就没有这本领。

英文我不在乎，但得要日文解释。日本教师并不强迫你学习，但第二天上课，就会叫你：“朱君，你把这一段给说说。”他是随便指的，他自己是不讲的，只最后讲几句。你站起来说不出来，你寒碜不寒碜。我在前一天晚上就得查字典搞清楚，特别是德文。日本人学外语只是为了看书，不是为说话。

所以老师教了一个礼拜的德语，发音还没有教完，文法还没有教，就立即念歌德的小说，突然得很。我记得刚学德文A、B、C，我还在悠哉悠哉，突然老师就叫念歌德的小说：《盖洛爱塔》，那是一个爱情故事，讲两个青年相爱。女的因为一个事故被打入冰山，卷到水里去了，成了冰人。男的爱情很坚定，一定要找到他的爱人，他去了冰山，把冰打碎，把爱人救活，终成眷属。

钟：您讲的这样清楚，可见当年学习用功。

乐：我一个字一个字查的呀。文法还不清楚，一句句去蒙。日本一高生说这是愉快的三年，我说我苦死了，天天查字典，星

期天也不出去玩，顶多星期六下午或晚上去看看电影。

日本的图书馆很方便，就在校内，白天黑夜都可以去，我们用功基本就在图书馆里。我学的哲学、伦理学，是属于西方体系，同我的观念没有一点抵触。我在上海时一点也没有学过，只学过似是而非的三民主义。日本人是从学问上学，并不是灌输人生观。教材也多是教师自己编的，他们多是第一流的学者，可以当东大教授的。

钟：这里有个小问题，关于哲学，如果是日本人写的哲学书，会不会掺进日本原来的传统哲学体系？

朱：他们不是把西方学问当做西方学问来学，他们是当做人类学问来学的！这一点，我们中国必需学习！

钟：对，这一点，中国人并没有解决。

朱：你不把黑格尔学问当做自己的学问怎么行？你不把人类精华当做自己的东西怎么行？日本人就是把人类精华全要变成自己的，并不认为是外来的，学起来就快很多。日本人穿西装比西方人还讲究，并不认为是外来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很多地方应该反省自己。

钟：中国方面反倒有一种解释，就是张之洞^①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。把这些人类知识全放进西用部分了，以致现在解不开这个扣。

朱：这种思维方法，中体西用观，不是辩证的。辩证法要否定旧的，要扬弃旧的，而全人类文明是要吸收。这事不能闭关自守，不能在头脑里锁住自己。所以我们在日本学到做学问

^① 张之洞（1811—1897），直隶南皮人。同治年进士出身，历任晚清重臣，积极推行改革的新政，但又坚决维护封建王朝及思想，在其《劝学篇》一书中鼓吹“旧学为体，新学为用”，成为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争论不休的“体用问题”。

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要吸收全人类文化的精华。在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誓言^①里有一条是：“广求知识于世界”。这是日本的公式。

钟：您记得真仔细，我看了好几遍也没有记住。

朱：那5条对中国现在还是有借鉴作用。这是一个民族富强壮大的根源之一，寻求知识，这学习不是很容易的，要下苦功夫的。我在一高学习时养成的习惯，就是从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学习。到现在我岁数这么大了，别人在著书立说，我还在学习，天天寻求知识，向人类学习，向现代学习，向世界学习。人生应该这样，中国本来有这样的古训，学无止境嘛。但是现在学海无涯也不知道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成了空话，流于空谈。当然，我不是轻视自己民族。问题在我们要反省，要追赶世界文明的进步。

钟：特别作为学习方法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。

朱：现在我们还要追赶世界先进。做半吊子，还没有怎样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拿出来就闹笑话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这话就不谈了。

我在一高时，把自己学得坚强又踏实。我原来算是少爷，在那儿真是改造，生活自理了。同时，天天同日本学生在一起，我的任务比他们重得多，我必须赶上他们，压住他们，以免被他们看不起。生活三年间并不愉快，我要表现中国人的好强。我在中国学英文时要大声念，他们则不出声。我第一次在屋子里

^① 五条誓言：日本明治天皇（1852—1912）推行日本明治维新，在1868年3月发布“五条誓言”：一、广兴会议，万机决于公论。二、上下一心，盛行经论。三、官武一途以至庶民，各遂其志，人心不倦。四、破旧有之陋习，基于天地之公道。五、求知识于世界，大振皇基。它成为日本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。

念，后来的日本有名的文学家，中村真一郎^①，搞法文的，他当时就说：“你这不是影响别人吗？”我这才明白自己的习惯不妥。他们的道德水准比我高，他们考虑别人，而我只顾自己习惯。

生活中，日本学生都有一种青云之志，都以破衣破帽为荣，光头，穿制服，不穿袜子，穿木屐，谁也不以为耻。是一种活着的传统文化，有一种力量，中国古书的名士中还有那种品德。所以我去日本留学，比去欧美留学有好处，我不后悔。我的学问对中国更有用，更实在，更辩证。

日本学生体力比我们好，军事训练，他们扛着三八式真枪跑步、行军，出门旅游也是行军。中国学生出门旅游是背一包吃的，没有精神。日本学生去乡下，一直扛着枪，打着绑腿，精神就不一样。

钟：您在假期做什么？

朱：一般暑假去海边，伊豆、房总，集体去，很便宜。富士山也去爬过，山底下有住处可看书，我没有上到山顶。我在房总海边度假的那年，聂耳就死在那里。

我同家里常有通信，有一次家里还从邮局寄钱来。我一进一高，就考上庚子赔款，当时又没有现在的打工思想，所以没有金钱问题。我每个月有36块钱，我只用16元就够生活了，剩下钱就买书了。我只考虑怎么学习基本功课，我学的是要经国济世的经济科学，极为单纯，指导我的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狂士思想。

我学习了西洋史、文化史、经济史等，其中中国部分很少。

^① 中村真一郎，1918年生，日本作家。其主要作品有：《在死亡的阴影下》（1947年）、《爱神与死神》（1950年）、《空中庭院》（1963—1965年）、《四季》（1975年）等。

日本人很重视一个问题：资本主义是怎样从封建社会过渡来的？我的学习围绕这个问题。

一高每年有一次纪念活动，全体集合，有1000多人，个人可以自由上台讲话。我有一次也跑上去讲了一通，我印象很深，我要表现中国人的精神，表示中国人的力量。

后来学校搬家到驹场，房子是钢骨水泥的，就没有本乡那种东方味道了，宿舍有床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在本乡时代，环境艰苦，学习最丰富，一跑进这古庙，就如到了人类财富之中，很有收获。我有一位老同学，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临死以前他写了一篇回忆我的文章。我那时在东京大学研究院，他则参了军，我们在马路上碰到了，说去喝杯咖啡。我当时对他说：“你当心，日本要败了，你赶紧逃出来，别去送死。”这种话，日本宪兵听到的话，当时就会抓起来的。他是军人呀，吓了一身冷汗。他写道：“我们的友情超乎一般社会利害关系之外。”要不然的话，我会被抓，他也被抓；他还可以抓我。你看看，这是我们在一高生活中体验到的。他叫河西健一。

在学校吃饭时，不全是日本饭菜，有朝鲜菜，朝鲜汤，杂烩汤，朝鲜芝麻烤肉，蛮好吃的；也有西洋饭菜，平民化的。生活的多元化，逐渐摆脱我这个中国的一元化生活方式，把外国的全融进来了，像咖喱饭也不说是印度的。

当时一高有30多个中国留学生，有理科的、文科的，大多数是从东北去的。那时已经成立伪满洲国，日本文部省就想在一高成立伪满一高同学会，关内则为中华民国同学会。当时中国同学很团结，80%以上是爱国统一进步的。上面交代下来的任务，学校也知道不好办，校方要我们改。当时主导是关内去的学生，我们就开会，坚决不同意成立伪满洲国同学会，又不能不成立同学会。因为我是学生头头，一高专门管留学生的老



1979年朱绍文在东京与老同学、当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会见。

师叫竹田复，汉文老师，就叫我到他家去，招待我吃饭，说我怎么好，怎么勤奋，要培养我等等。（他儿子后来也做了东大教授，曾经来中国北京做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。）我和同学们商量，决定第一不分，第二顶住他，后来就成立‘一高同学会’，我当总干事。这就种下了我后来坐牢的根子。每年中国新生入学，中国毕业生离校，我都去讲话。我讲大家要抗战爱国，第一，必须团结；第二，不要多说，沉默；第三，拼命劳动、学习，回国建设国家。我每次讲这三句话：团结、沉默、努力学习，在同学间流传。我是用德文讲的，是受日本学风影响，这样使大家印象很深。

当时在同学会里，又成立一个图书馆，房间比较大，有书架，日本人不来，我们有时下课去聊天。后来进步书越塞越多，留学生思想也越来越鲜明，有共产党，也有国民党。我们这些书呆子，什么也不是，也不知道。不过大家矛盾也不大，主流是抗日。

钟：图书馆里有当时留学生编的刊物吗？例如《质文》？

朱：有。

在一高毕业的周幼海（周佛海之子），后来加入了共产党，他那时带有共产党的书。我第一次看到斯诺的书，就是在那儿。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前途，看到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，是英文版的。我当时思想就开朗了。中国现在需要学习的，不是建美国式的高楼大厦。看看日本人才，一流学者全在大学里，教出高水准的学生。中国关键在基础不厚。

我在一高毕业时，京都大学是直升上学的，东京大学则要考，考不上话要延一年再考。我要比试比试，就考东京大学经济学部。最没有把握的是日本历史，很难记住，准备来不及，第一年就没有考上。别人去了京都大学，我则留下来再准备考。

这一年时间，我去学了点法文，日本漂亮女孩子时髦法文，我也就跑去凑热闹学，法国老师教，上来全是法文，动作说话全上。当时我的重点在学日文，英译日，日译英。在缺乏把握的情况下，这种学习对自己意志和生活是一种锻炼。我记得冬天时，我每天在榻榻米上，裹着毯子，在小桌子边，一干就到夜里12点多钟，这滋味真不好受，因为没有前途保证，怕考不上。

后来我遇到东大经济学部的教授山田文雄，他是河合荣治郎教授的学生。河合教授是引进英国经济学、哲学、社会科学的鼻祖，是自由主义的，他也是反战的，但并非马克思主义的。

他写了一本书，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，批判军部；他还写了《社会政策》等书，他给当时所有日本知识分子以影响。他还出版了一套《学生教养丛书》，是对现代高级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理性和人格进行指导。他提倡人们想：“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？”以及“我们应该做什么？”人就必须有志气，言行一致。我这一年就读了不少这样的书。因为他受到批判，大家更要读他的书。山田教授介绍了木村建康先生给我，帮助我学习翻译，受益无穷。

来年3月再考试，我的运气好。战前东大教授在社会上威望非常高，军部荒木贞夫来当文部大臣，他下令要解除河合荣治郎教授职务，整个社会震动，有人公开反抗。东大一直是科学的殿堂，科学的自由，政府不能干涉。在此之前，矢原内、有泽广巳^①、大内兵卫、大森义太郎、山田盛太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教授，已经被日本军部解职。现在日本在战时走向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控制，把河合教授也解职了，东大的学生起来反抗，说是侵犯了科学的自由，侵犯了人权，侵犯了言论自由，侵犯了教授写书的自由。那年是1938年。

我那时当“浪人”，也跑东大。看到山田教授同另外三位助理教授，他们为老师抗议一同辞职，我们的思想当然与老师共鸣。我去找山田老师，请教关于我考东大的问题，他说肯定在你的英文翻译日文上出毛病。他就介绍一位35岁左右的助理教授，河合老师的助手，很有学问。他跟着老师一起辞职，并且充当老师在法庭上的义务辩护人，在法庭上反抗。在那个时代，有这样年轻的知识分子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我这一辈子也就无

^① 有泽广巳（1896—1988），日本经济学家。东京大学教授。被誉为“日本经济起飞之父”。

形受熏陶，印象很深。他叫木村健康，他接受我这个学生。我每周去他家念英文，译成日文。像英文哲学著作，洛克的、霍布士的等等，因为考试考哲学。我沾了光了，因为东大出题阅卷就是他们这些人，知道倾向习惯。他学问也很高，英文很好，要求一个字也不能错，主动词、副词，什么形态，一个词也不能错，含蓄的意思要硬译。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，3月一考就考中了，名次还在300多人中的前100人中间。我这样就鲤鱼跳龙门了，我一个中国人，孤苦零丁，总算考上了，那是1939年。我就想，世界上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。

进东大就如鱼得水了，我搬到新住地，同学有隅谷三喜男等人。在东大上课自由自在，也没有人管，只要你考试及格。我最信服的两位年轻老师，一位是大河内一男^①，他后来是东大的总长。他那时30多岁，当时也辞职了，但是东大的总长把他们三人找去说，你们要为学校考虑。现在你们为老师考虑，但学校、经济学部，不是你们个人的，你们应当留下来，把经济学部重新建立起来。大河内老师就留下来了。虽然殉师是东方道德，但学校方面的责任要他留下来，这是矛盾的。还有一位搞近代经济学的安井琢磨老师也留下来，只有木村老师不肯留下。

我考进东大，第一年是一般课程。幸亏当时有大河内一男和冢久雄两位教授，现在一位已经去世，一位近90岁了。他们是日本社会科学带头人，我们能听他们的课，仿佛是在当时黑暗中一盏明灯，我们在下课后常常议论。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派有二：一派是讲座派，一派是劳农派。这两派代表全在东大，劳农派是大内兵卫；讲座派是山田盛太郎、平野义太郎等

^① 大河内一男（1905—1984）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、校长。其著作有《德国社会政策思想史》、《黎明期的日本劳动运动》等。

人。岩波书店出版《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》7本，因此称讲座派。争论关键在日本革命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？劳农派认为日本是资本主义社会，应该倒向资产阶级；讲座派认为日本是军事性的、封建性的，应该有个民主革命过程。换句话说，两派都认为日本要革命，但对社会性质认识不同，理论基础不同。所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是教条的，它是有理论深度的，结合本国现实。

河上肇教授是另一个例子，他在社会上工作到40多岁了，看到社会上的贫困，就写了著名的书《贫困物语》。中国翻译了他的《政治经济学》。他的思想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转到马克思阵营的，他作为东方文人的品质很高。在当时，他刚刚翻译出《1932年纲领》，是莫斯科对日本共产党的指示，他是从德文翻译成日文。他加入日共。他的3卷书《资本论解释》中提出的劳动价值论，都是有错误的。他的朋友、学生就展开论战，包括小泉信三，栉田民藏，这些优秀人才都展开批判。我们在学习中琢磨琢磨，就有很大收获。河上肇是追求真理的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有些理解不到，但言行一致；他有求道的精神，不求名利；他清贫，但很有威望。他可以算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形象。日本学者对中国影响最大的，当年就是他。但当年真正日本马克思主义水准，中国不知道，真正日本学问没有学到手。我在当学生时就有此感觉，回国多年，看来看去，在中国，社会科学概念、地位都很差。你要现代化，没有社会科学是不行的。我们的前辈也如此，严复^①他们回来也没有重用，他的

^① 严复（1854—1921），福建侯官人。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，1877年至1879年赴英国留学。回国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等职。以译述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、《群学肄言》、《群己权界论》、《穆勒名学》、《法意》等闻名全国。辛亥革命后，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，文化上提倡尊孔，反对五四运动。

同学伊藤博文^①回日本就受重用。严复最后只能抽鸦片，他的现代化理想也没有实现。

我在东大经济学部，看到他们教授向西方学习，他们本身没有现代化的文明，同传统中国人一样。但是他们主要学习英国和德国，这就和中国转学日本是不可比的。他们学习得非常地道，认真学习第一流学者的书，非常认真系统深入地做工作，所以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学部犹如官学一般。德国历史学派是爱国主义的，主张发展本国经济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落后国家的发展经济学。他们不跟英国走，不跟自由主义走，他们引进李斯特^②的国民经济学，讲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怎么样才现代化。另外，同时也注意德国出现的工人阶级劳工运动思想。当时，德国和日本，有相同的底子。所以我在学习中体会到，一个国家民族要现代化，不认真学习，不尊重科学，特别不尊重社会科学，方向和政策不知道怎么走，青年一代不知道怎样培养，很危险。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叫青年人向全人类学习先进的历史的学问。日本的东方知识没有放弃，史实摆在那里，它的儒家研究比中国还深，它的资料保存比你还好，它的生活方式保存很多中国唐代的東西，而我们早就没有了，连埋在地下的也破坏不少。所以一个民族，不作反省，不能反省，不能头脑清醒，是很难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的。不管你人口多么多，还要再受人家奴役。这个问题仍旧没有解决，你不要以为现在中国好像很强大，你不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这个民族自立

① 伊藤博文（1841—1909），日本政治家。1863年始多次出洋学习。1885年任第一届总理大臣，是明治维新重臣。

② 李斯特（F·List，1789—1846），德国经济学家。国家主义经济学派的主力。其名著为：《政治经济之国民的体系》，中译名《国家经济学》，王开化译，1927年版。

自强的根不深，根本问题依然存在。我在学校时 20 多岁，看到日本是怎样培养年轻人的，我也反省自己国家，我觉得我们既没有学到人家先进的学问和经验，也没有学到培养青年人的好方法，并且还很不理解。

钟：真是很奇怪，在清朝末年的中国书中，对日本教育经验介绍比较多，而到 30 年代以后反倒少了。

朱：这是没有人才啊。到现在也还是有许多冒充的，他们不可能深入了解别人和自己。

钟：也许他们是觉得不需要了解。他们认为：中日之间是平等的，你有东京大学，我有北京大学，彼此彼此。

朱：对，有这样的思想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

我在东大时，真正进入日本社会底部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面对当时支离破碎的祖国，只有拼命学习。我的观念又倾向马克思，怎样解决中国时代的困境？我自己在那儿苦恼。

钟：您在学习国民经济学时，是否就是认为可以用在解决中国问题上？作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方向？

朱：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。我的导师是大河内一男，他后来是经济学部长，东大校长，是日本权威学者。他对我说：“你研究德国李斯特经济学，可能对中国有参考帮助。”我在他指导下学习。到今天，国民经济学仍然是对中国最有参考价值的，完全可以加“最”字。

钟：从您的介绍来看，您抓住了中国、日本、德国在经济学术上的特点和不同。那么，您在学习时如何去理解和收集资料？

朱：我当时先看原著，包括马克思原著，以此为底子，和中国结合。我回国一直没有离开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，我回国在复旦大学，也是教经济思想史，后来南汉宸行长调我到北京，

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，后来再调到社科院经济所，我还是搞这个。我也带博士生，樊纲等人是我培养的。现在国家需要知道，市场经济是什么？所以我在院领导帮助下成立了一个“日本市场经济研究中心”，引进日本的市场经济知识，包括有德国、美国的市场经济比较知识，现在我才迈出第一步。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写日美市场经济比较、德日欧美市场经济比较。中国要借以建立新经济体制，一个国家没有知识，没有比较怎么行？我的人生课题兴趣就在搞经济思想史，现在时势所迫，为了国家需要而深入这个方面。

钟：我倒有一个看法，就是通过您的学术经历发展，作全面的德、日、中经济思想介绍。这种介绍只有您能做，没有人能够代替。希望您能考虑。

朱：你的提醒太好了，我要想办法提出这个课题。年轻人的环境不同了。

我觉得我在东大打下了基础，分析问题，研究方法，做学问都有了。李斯特提出的指导思想是：“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。”他又提出“与祖国同时考虑人类。”现在许多高等华人，在外面发了财，生儿育女，但还是不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就应该考虑，一辈子都在这个问题上，自己苦恼，永远要学习。

另外，我还受一个老师影响，他是大塚久雄，是研究英国从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的过程，劳动者怎样现代化的？从现代生产关系考虑如何形成英国类型？他是从原始档案搞起，成为西洋经济史一个大塚学派。他的研究对许多东方发展观念和兴亡规律都是很有用的。其中许多分析、概念、例证，对中国都非常重要。例如以贸易立国的荷兰，后来就一蹶不振了，而以产业立国的英国，就成为世界工业强国。以制造生产就有根，以买来卖去就只是昙花一现。这些历史教训和发展规律，我看对

今天中国很有意义。

钟：我们有国营企业呀。

朱：这些国营企业不是真的有效，是没有现代化生产的，是命令的产物。现在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，正是苏联模式的恶果。我现在组织东大的中国留学博士生，翻译一本书：《日本的企业制度》，我在序言中已经指出这个问题，仍然是中国怎样现代化的问题。真不知道要奋斗到何时？我岁数大了，有时很感到时间不够用。最近我在评博士论文，感到很难，让他过关，我良心不行；不让过又很难。斗争几天，还是以良心为第一，不随大流，我维持自己科学良心，不奉承。

钟：请您谈谈在东大时的同学、老师情况。

朱：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一些老师，当时老师中间的左、中、右已经分明。我也见过河上肇教授，是他从监牢里出来以后，那时他住在东京一个小房子里，没有工作，身体也不好。我和东大的同学间则关系很密切。

中曾根康弘^①同学当时是法学部的，我是经济学部的。以前经济学部属于东大法学部，后来分出去，所以房子、教授都是合用的。我学商法、保险法、民法全是法学部老师教的；法学部讲经济课全是经济学部教授去教的。学生互相串课，上课也没有同班概念，各人各自为政，自由散漫。中曾根是静岗高等学校毕业来的，他和一个同学是莫逆之交，那同学和我也同班，是昭和16年毕业生。我们在一起上学、聊天、喝咖啡。我同他深谈还是在他当了首相之后。

1979年，我的老师大河内一男想见我，我也想见他。东大就邀请我一人去日本，国内当时只准两人一起出国，我又是在

^① 中曾根康弘，日本政治家，1979年出任首相。

6月刚刚获得右派平反。当时许涤新要拉我来社科院，编政治经济学词典，总调不来。正好人民大学成仿吾^① 要找一个精通德文的人来翻译《资本论》，他写信给李葆华借调我，我才得以出了人民银行。但我也不同意当教授，怕再犯错误，我那时已经60岁了，我去“人大”肯定不合适，许涤新就从“人大”把我再挖过来。算算已经22年时光就这样白费了，仅仅学问没有丢。我还是感谢马克思，要不然顶不住这样的打击。我的观念，第一要能吃苦：在日本监牢里天天死去活来的生活，我经过半年；回来当右派又是精神上的折磨，有些想不通。

1979年春天，有泽广巳老师带领东大老师来北京，四处打听我在哪儿。我原名朱朝仁，朝廷的仁者，是我出了日本宪兵队监牢以后，改成现名朱绍文的。这一次允许我去北京饭店看老师，他一见我高兴极了，说：“唉哟，你的老师在到处找你，在国民党那儿也找不到你，今天可找到你了。”我的一位老同学，在1966年跟宫本显治来中国时，就到处打听我，问来问去也问不到。其他还有朋友来找，我是右派，那里也问不到的。有泽老师看见我很高兴，我也没有说我当右派，他回去告诉老师，我也写了信。东京大学就发函来，邀请我去三个星期，旅费全是他们出。函到社科院，就麻烦了：让我去吧，这是一个右派，而且是一个人去，不合规定的两个人以上，于是老是不批准。于光远当时是副院长，他说：“为什么不批人家？你还怕他不回来呀？我担保，这有什么关系。”后来外事局对我说：“去一个礼

^① 成仿吾（1897—1984），湖南新化县人。中国作家、教育家。1917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学造兵科，1924年回中国。发起参与“创造社”。1925年参加国民党，任黄埔军校教官。1928至1931年赴欧洲，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。1949年以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。其作品有：《流浪》（1927年）、《长征回忆录》（1977年）等。

拜就回来吧！”我说我一定如期回来。最后给我两个礼拜，这两个礼拜，我学到很多东西。1979年的日本已经变成经济大国了，我就重新研究日本。它的过去我知道得很多，而战后的日本到现在，我又研究10几年了。对于那种去日本就充行家，抄来抄去的书一本接一本出，我不屑这样干。我对这种研究方法也很不赞成，看不惯。要把日本研究清楚是很不容易的，日本经济战后之所以高速发展，是需要深入观察的。后来我每年都有机会去日本交流。

我就这样与有泽老师接上了，社科院赠他名誉博士称号，他送社科院2万本书，由日本研究所保存。他知道中国懂德文的人不多，他的学生里就我一个中国人，他就把他年轻时留德时的一部分书，送给了我，这几个书柜里就是他赠我的书。他同我说：“日本能够复兴，应该感谢两个恩人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中国。如果要赔款，日本就完了。当年甲午战争，日本要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，库平银，十六两一斤，第二年又立即要换成英镑。现在中国没有要日本赔款，日本才得以有积累。”这是老师在去世前两年讲的，这在日本学者中是了不起的。现在日美、日中老闹矛盾，就不同了。

要想学习日本，就要引进，就要深，一般中国人，不了解社会科学要走什么路。前辈没有能力把西方学术学到手，严复没有这个力量，这不是文化搬家就行了。前辈对西方社会科学不太理解，引进翻译似是而非，更渺茫了。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，就有学西方的基础，理解多，翻译恰当，人数也多，质量也好。日本在翻译后就东方化了，比如一个经济学，中国翻译成计学、生计学。日本用中国汉学，经国济民，创造又拿过来，变成自己的财富。中国通过日本研究现代化，吸收人类文化财富，看来是一条必经之路，也是捷径。现在一些年轻人，挂

着博士，学了点外国名词，对中国情况一点也不了解。前几天有人在电视上讲“消费者剩余”，听众不懂，中国经济学家也不懂，他是拿来唬人的。中国社会科学界，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危机。

钟：是。这就要看专家在一个社会进步里的作用了。

朱：我在1979年又来到东京，老同学关系恢复了。我30多年没有接触了，22年右派生活也没有同中国社会接触。我想，中国古代划地为牢，划右派比这更高明，划圈圈为牢，划帽子为牢。你戴了这帽子，无形的，但这就是天牢，什么人也不敢跟你接近。我这几十年就是进了这么一间“没有铁窗的监牢”，到那儿都坐在其中，全社会把你作“人非人”，打下十八层地狱一样。我幸亏有点信念，知道历史潮流，知道这是反动行为。好人当作坏人还不是反动？好话歪曲成坏话还不是反动？只要你能忍受，在逆境中，连工资都没有。陶大镛^①说，人家让我踩碎玻璃也得踩呀。

现在我又在22年之后被再放出来，我又活了，人生不就是为了人类、为了社会工作吗？除此以外何所求也！现在也无所求，我没有为个人，我现在培养学生，给下一代尽力。

钟：您的行为与想法，从您这一代老学者看是完全应该的。在我看，还是应该从历史角度，把您这一代写出来。

朱：我是需要摆脱许多杂事。

后来，东大总长邀请我去交流，到经济学部重新学习，许多老同学来谈话，我的日语在一周里就恢复了。当时要开大河内老师纪念会，要我作公开报告。老师又害怕我会宣传共产主

^① 陶大镛，1918年生，上海人。中国经济学家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。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“六教授”之一。

义，他叫一个同学对我讲，要先看看我的发言稿。我明白了，我给他们看，我是讲我作为学生，从老师那里学习得到了什么？第一，老师教我们思考问题，必须历史地考虑，从发展历史思考；第二，不要公式主义，不要拿教条公式、模式，套到自己身上；第三条，任何事要自己主动思考，不要盲从，不要仅听别人的，要独立思考。这几条我一辈子都牢记，受益无穷，这里有方法论，也有人生观。

当时日本报纸上、杂志上都介绍我来了，中曾根康弘也知道我来了，他当时刚做首相不久。昭和十六年会总干事久保田君是能够夜里打电话到中曾根家里，随时能把他叫起来的唯一的一个人，因为他们是从小的交情。他当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。他告诉中曾根，说我从北京来了。中曾根就说能不能够约个时间聊聊天？他说：“你忙呀，你定个时间吧。”就叫中曾根安排时间。一个多月以后，中曾根的秘书打电话来同我商量，让我在17日上午10点左右，直接到首相官邸来就可以了，不要通过任何关系，直接找秘书。当时12月冬天，我同中曾根不见面有30多年了，但轮廓还记得。我找了个瓷的花瓶，准备送给他。那位秘书的电话是打到东大客座教授研究室，我也不要他拿车子接我，只要他同门房说一声。我那天是坐地铁去的，出站上来就是首相官邸。我找到秘书，等了约5分钟，就请我进去。就是现在电视上看见的首相会客室，房间不大，小小的几把沙发椅子。

他一出来，就说：“哎哟，还记得你的眼睛眉毛的样子。”我们在学校时，互相天天在课堂外过道上活动，总有印象。这次我们不是谈官事，就聊起天来。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作报告，朋友告诉我，他是鹰派，新国家主义者。但他在演讲中说到老师河合荣治郎，提倡自由主义。我对此很赞赏，尤其河合老师是

经济学部的，看来中曾根是要改变他在政治上的形象。所以我告诉他：“我在电视上听了你的讲话，很好，你提出河合老师是对的。社会上说你是鹰派。”他就笑了，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是新闻记者把我写成鹰派。我进过海军，当中尉，又当过自卫队长官，社会上总把我同军队联系起来。我又总是强调振兴，要爱国，这一下子就成这个形象。”我说这也有道理。这就谈开了，我估计是他第一次谈，别人不好问他的。我还对他说：“你下一次讲演，还可以再提出一个老师，就是更进步一点。是大河内一男老师的社会劳动政策，更为平民主义的观点。”那时大河内老师70多岁。他回答我说：“是吗？”他不知道。后来大河内老师去世，他去悼念，慰问亲属。

秘书原来通知我谈话时间不超过20分钟，但我们谈呀谈呀，我向他提出中日之间社会科学交流的重要性，他回答说：“我看很重要，不然的话，相互信任就不可能有基础。”他又说：“给你一个任务，你是最适合做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个桥梁。我痛感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不能够相互理解，就不能够实现。你考虑一下，请一些中国学者来日本，如有合适的社会科学代表人物，你写个名单给我去办。”我们谈了约40分钟，门口已经有一大堆高官在那儿等着办事，后来秘书来打招呼，我就主动告辞，他才想过来，他临别时说：“以后再约个时间聊吧。”这是老同学友情很深的聊天。第二天，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了中曾根首相和我的“恳谈”，上面写着中曾根说：“听了朱教授的话，痛感日中之间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的重要性。”

钟：上次您讲了很多。那么，您做学生好好的，怎么被日本政府抓起来？怎么一回事？

朱：这一段历史呀，是很多日本朋友关心的，我也没有公开讲过。

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，被抓的有10多个人，原因就是我们在一高时的同学会，情况在上面已经讲过了。我们年轻人能力有限，但齐心爱国，我们既然在日本念书，要了解日本才能打败日本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们就拼命念书，为中华民族的灾难承担自己的责任。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思想。我是书呆子脾气，而留学生里良莠不齐，我后来已经进东大学习，每次一高同学会开迎送会，他们还是把我找去作演讲，无形中我就成了领袖。但我本人没有想过，因为没有组织。

我在1941年12月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，直升大学研究院。我的老师大河内一男对我说：“你还是留下做研究吧，研究德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派，李斯特的经济理论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有效。”他是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者，保护关税，我到现在还是这一套思想。我的博士论文《德国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研究》，有20多万字，我在1943年就写完了，但没有来得及发表成书，老师是完全承认我的。其中一部分，我以“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现代化”为题，在1943年的东京《扬子江杂志》上连载两期发表。我是大河内老师的开山弟子，他是把我的手教的，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总感到自己不成熟。

钟：您在1944年如此顺利地写论文，他们怎么会来抓您去坐牢呢？

朱：就因为我在一高不断地活动呀。听说是被一位学生密告了。

1944年，日本快失败了，情况很危险，就抓思想犯了。他们派人到处盯梢。我是不懂的，当时国民党有地下组织，共产党有地下组织，都靠着我干，我成了打前锋的。现在我才知道他们的身份。我当时书生意气，常在日本公开讲：你们日本人教我们爱国，我不能爱你们的国，我当然要爱中国。这是老师

教导的，一高的校旗叫护国旗，保护国家的旗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我也一样呀。

他们特高来查我家里的书，房东也没有告诉我，他们一看我整个倾向是左倾的。那时，打仗很厉害，平民一天只能配给一碗饭吃，空袭也来了，蔬菜也没有了，鱼虾也没有了，东京人有乡下亲戚的都走了。我作为留学生也考虑该回去了，老师也说：“快陷落了，你准备回去吧。”那时还没有办法走，因为没有旅客船通航。

1944年5月20日，早上4点钟，“嘭、嘭、嘭”一阵敲门声。我那些天已经有被抓的思想准备，我想，4点钟，一点也不客气，还能有什么事！他们开来了小轿车，两部大卡车。

钟：哟，这么多呀，他们这样“优待”您！

朱：唔。我当时结婚不久，刚有一个小孩子。我就开门，门口站着的人说：“我们是宪兵队的。”其他就不用说了，我只说了一句：“我去换一件衣服。”我就换了一套西装，不许我们说话，不许我同妻子告别，两个人把我一夹，就上了小汽车。我看现在日本抓人还是这样。给我戴上手铐，到了宪兵队就拷问。问我同共产党组织关系，叫我把名单交出来。我到哪儿交去？又问我同重庆的无线电联系号码，交出来！把东京小组名单交出来！我从来就不搞党派活动，根本就没有可交的。他们说：我们跟踪你已经一年，你是煽动思想嫌疑犯，你是赤色嫌疑犯，你要交代共产党地下组织，你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。

钟：您的被捕，各大报有报道吧？

朱：那时是军事管制，一切消息都封锁，只有同学间互相转告。我的书就被那两大卡车拉走了，这是我省吃俭用买来准备带回国研究用的呀。

钟：这些书是您的个人财产，后来日本军部归还了吗？

朱：你太天真了，怎么会归还我？

钟：这笔账要算，他们专案是有底子可查的。

朱：我先给你讲完。

第一天，我泰然自若，保持一个中国人的尊严，更没有求饶。我反问他们：为什么抓我？我没有名单。你们不是知道吗？你们不是查找了吗？为什么还问我？我没有同延安联系，也没有同重庆联系。我没有电台，我是学生。宪兵就说我不老实，不招就上刑。他用竹棍当头就给我一下子，血就下来了，我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哟，这么厉害呀。然后他们就给我上一种刑罚，把我的手拉过去，桌子上放有许多铅笔，他放在我手缝间再用力一夹，那个痛啊，我叫了起来，痛到骨头里面去了。中国古代有这个刑罚，日本人学了去。痛得我要死，我一嚷嚷，他倒也就停下来，怕外面听见吧？但我是你打不打我都没有，审问一个多钟头，就把我押进宪兵队监牢，那是在东京九段下宪兵总部里面。

牢房有6席大小，只有一个马桶，一条毯子。房间没有窗户，前面是粗木格子，地板是水泥地。走廊上有灯，木棍格子外有一个宪兵24小时站在那儿监视你。吃饭倒比外面好，因为是军队配给。老百姓在外面每天只有一顿饭吃，在这儿每天吃三顿饭，中午还有鱼，小墨斗鱼。我在那儿押了三个月，妻子不能来看，什么人都不能来看，与世隔绝。

审问一个月以后，我仅跪水泥地就死去5—6次。就是那普通的水泥地，跪在上面，我原不觉得怎样，但跪在那儿久了，40分钟就满头大汗，再跪就昏过去了。他们在我脸上浇点冷水，接过来再送回牢里去。就这样天天搞我。

在抓我的第二天，他们就大举抓人了，把我的弟弟也抓进来了，把弟弟同学也抓了，东大同学同我有关的几个，一高的

几个，一共10几个中国人。现在国内还有两三个人活着，我当时全不知道。

有两次夜里把我叫醒，两三点钟的时候，拉我去受审。房间里有许多宪兵队的大官，排成队，很阴森。审问我的下士（中村××）说：“你看，今天是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说清楚了，我们让你见东条英机。东条英机都知道你这个案子，他们很关心你，认为你是中国一个很了不起的优秀青年，我们也不希望你送命。”我说：“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还是这样。”这样反复又审问一个多小时，审问的房间很大，灯也很亮，我心里想：恐怕今天要定案了，顶多一枪就完了，我是世外之人了。结果又没完。我在宪兵队没法子刮脸，胡子长得很长，小宪兵很尊敬我，偷偷地对我说：“你是中国的孔夫子呀！我们大家都这样说。”送饭时也给我大一点的饭团。我也没有想到我会给日本青年人这样的印象。

这样审问我两次，我也习惯了，也不过如此，这种场面对生死置于度外的人无所谓。后来就换了一个宪兵尉官来审问我，他态度好一点了，每天早上9点钟叫我去，他出四个题目，叫我写回答。然后同我聊聊，查思想。我就天天写起论文了，恐怕写了有几十万字，反正我年轻，也不知怎么那么大的能力，写得他们打心眼里佩服我。本来他们是想从文字里挑我的毛病，不料我就有这点本领，写得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钟：这些“小文章”都留在哪儿呢？

朱：我怎么知道？

钟：不行，不行，这要找，一定要找回来。

朱：你也书生气了，日本怎么会保存宪兵队的档案？

后来呢，他们最后的一招，是对我说：“你也不要兜圈子了，我们有证据，我们今天拿证据给你看。”就带我下到地下室，有

三四层楼深，黑蒙蒙的，盖有许多红布。又是罚我跪在那里，昏过去又再把我弄醒。我醒过来说：“你给我看证据吧。”他没有证据，就是搞这么一个阴间世界来吓你。我心中如果有鬼，是躲不过的。我没有就不怕，他也什么也没有给我看，这是诈骗。就这样折磨我三个多月，人都不像样子了，连路都不能走了。我坐在水泥地上三个月，胡子那么老长。

钟：您在受折磨时，有没有想到出来的一天？

朱：没有想到，没有想过。我已经绝望，因为他们肯定不放过我。但我的后台是东大，我的老师大河内教授跑到宪兵队，对他们说：“如果他有罪，你应该告他，送法庭去判罪；如果他沒有罪，你们不应该关他在监牢里。”这话是我后来才知道的，我当时完全没有自由。有一次，我一人的牢里来了一个日本犯人，我问他犯了什么罪？他说是做黑市买卖，很快就会放的。我就托他出去后给我爱人打一个电话，说我身体很好，要她放心。这人我连姓名也不知道，就把家里电话号码告诉他。后来这人果然打了电话，告诉了我的爱人。

钟：这事情真令人感慨，暴露了日本宪兵队既愚蠢又残暴。

朱：他们打人是很厉害的，“啪”的一耳光，我的半个脸就马上肿起来。他们是有打人训练的，有功夫。我经过这样多次夹棍，跪水泥地，上的刑罚是惨无人道的。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罪名？什么专案名？50年了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宪兵还活着？有什么档案在？

钟：反正要查一查。

朱：宪兵有一点没有错，我肯定是一个左倾分子。抄我的两大卡车书，里面有很多德文的《新时代》杂志，第二国际办的，还有《资本论》等书。所以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没有抓错人，而我也一直是这样的观念。不过我没有入党，我也不知道入，我

完全是凭良心做人。

三个月后，问也没得问了。外界压力也很大，外务省、文部省、东京大学、各个大学、一高、大东亚省都传开了：为什么抓这么多优秀学生？他们只好把我们转交给东京地方检察院，那就是巢鸭监牢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天有点冷了，把我们一个个叫出来。大家穿着囚服，抱着自己进监时的衣物，互相间还不知道，因为每个人头上扣着一个大斗笠，互相不知道张三李四。我们坐上卡车，被拉到池袋巢鸭监狱。我好几个月没有上街了，这一出来，好像到了世外桃源。我原来还以为大家要去枪毙了，但看看没有这架势。

进到巢鸭，换上巢鸭犯人的衣服，一个人有一个房间，三张席那么大。大家比较高兴一点，因为不挨打了，我以为要住上十年八年。房间里有马桶，马桶上有盖子，打开来拉屎，盖上是座位，可以看书写字。有一个铁窗，看不见外面的玻璃，可以斜看下面，下面犯人放风可以看见。我在宪兵队时，有几次宪兵叫我出来，带着我做体操，做完再放回去。我在宪兵队没洗过澡，也没有洗过脸，在巢鸭有洗脸盆，还有棉花被子，所以我第一晚睡得特别香，身下还有席子，还能在牢房里走走。

第二天，我就被检察官叫去，那检察官非常厉害，他上来就叫我交代：怎样从赤色思想转变为非赤色思想？转向？我说我没有转向。一个多钟头审问没结果，我认识比你高，学历比你高，我不怕你。他问了两次，没结果，他总不能拿书定罪。后来检察官换了一个，是东大法学部毕业的。他见我时，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最近才从中国回来。”我一听就放心了，他不会把我当政治犯了，因为这是朋友间聊天，他是搬同学关系。他接着告诉我说：“你放心，你的家属，你的爱人同孩子身体都很好。”他还把我爱人同孩子的相片给我看。我想，是越来越轻了。我

就提出来：“我想看书。”我已经三个月没有看书，我不能不学习呀。我当右派 22 年，都没有懈怠过，我都一样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。我曾把《反杜林论》原版念了一遍，把中国翻译的《反杜林论》中的错误指出 200 多处。

钟：那么，您坐牢还是要看书？

朱：是呀。检察官就问我想看什么书？我说：“请你同我爱人讲，我想看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、《大逻辑》，请她给我买来。”这是我在监牢里的收获，在外面绝对没有安静地看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条件。我看到人类智慧多么高深，康德的思想多么望尘莫及，多么伟大的思维力量。书是我爱人买的，岩波翻译的小册子，我就看这些书。在监牢里，日本神道教和尚经常来找我，做我的思想工作，还带我到佛堂里去拜菩萨。我也就去，带出去有好处，可以参观一下。

钟：吃得如何？

朱：这是最糟糕的了。每天一早，等于是一盆水，好像盐菜汤，一碗大麦饭，没有蔬菜，我根本吃不下去。我的心里是康德，我说给自己听：要安心立命。

三个月后，检察官找我，说他给我做了个结论，他念给我听，最后是“无罪释放”。看来我是沾了同学的光了，他写的结论四平八稳，他还说：“你放心，不久就可以放你了。”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。听说东大他们还开了会，据说讨论时他们发现，东大有这么一些从没有过的优秀青年，日本人还要培养什么样的留学生！因此希望我们不要介意。我什么也没有说，就放出来。听说宪兵队的人说：“什么人都可以放，就是朱朝仁（原名）不能放。他明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思想犯。”宪兵队要立功呀，打我也就厉害。我是幸亏没有搞名单什么的。

快到年终，他们把我放了。他们念了名单和结论：“无罪释

放”。叫我签字，无罪释放还不同意呀！那天晚上，被抓人的全出来了，包括我的弟弟，我这才看清楚有多少人。我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，有一个友好团体出面，请我们10几个人下饭馆吃一顿，吃得大家没话说。他们找到别府温泉，安排我去疗养，把我爱人也接去，养了一个多月我才能走路。有个朋友告诉我说：“日本宪兵队不甘心，还要抓你进去。”我想这个人有良心。

我养得差不多了，回到东大，已经是1945年3月，美国飞机来轰炸，美军就要登陆了。我的房东是东京道路局长，他告诉我，近卫首相在讲投降条件，维持天皇制度。日本飞机那一天生产不了一架，飞上去也不能打仗，两圈就掉下来。日本人还说：“看，打下美国飞机了。”再一看，太阳旗往下掉。日本人说：“完了。”叫我走吧。我想，再被抓就完了，就找人帮忙，找到一条货船，从下关开到釜山。到三月底，我同爱人小孩，偷偷地上了货船，到了朝鲜釜山，再坐火车到中国东北，再到天津，再到北京亲戚家里。我们到北京心里才安静下来，这就是我留学生涯的结束。

钟：如果没有日本宪兵对您的镇压，您正常的学习应到何时？

朱：我已经快毕业了，论文写完了，老师接受了。

钟：您作为中国留学生这样一个遭遇，在我们后人听来实在是令人震惊。这个大和民族，实在是……坐牢居然拉两车书去，我真想不到。他们也真愚蠢。

朱：我也想不到，他们会一本本查书，还编上号码。

另外，他们去抓我时，不让我爱人动，只能站在那里，也不准打电话。他们搜查，连炭火盆都倒过来，把草席也翻开来，还在院子里到处挖。我爱人大事不惊，还抱着孩子。她比我懂，我们的小孩没有奶了，她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承担责任，我先

生没有罪，我的小孩没奶了，你们要给我拿牛奶来。”她比我懂，她在日本念 20 年书，结果第二天真的把牛奶送来了，放在窗台上。大河内老师不能来，就让师母送来鸡蛋。这种场合我们师生关系是没话说的，感情很深。就先说到这儿吧。